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决策参考

2018年第1期(总第29期)

两会高教专辑

河南工业大学发展规划处编印

2018年3月30日

【编者按】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2018年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在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是高等教育做好各方面工作的重要遵循。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教育工作的部署主题鲜明，现实针对性强，对保公平、提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群众反映强烈、期待迫切的问题予以了积极回应。

关于如何扎实写好“奋进之笔”、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针对如何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打通政策“最后一公里”，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两会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

本期收集整理今年两会有关高等教育的相关资料，以期为我校深刻领悟两会精神实质，为把贯彻落实两会精神与推动改革发展工作紧密结合、把贯彻两会精神与落实年度重点任务有机结合提供借鉴和参考。

目 录

【报告摘录】	1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摘录）	1
【报告解读】	3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3
改革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8
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新动员令	9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12
【“双一流”建设】	14
“双一流”建设必须有中国特色	14
寻找“双一流”大学的气质和品格	18
中西部高校如何搭上“双一流”快车	21
【科学研究】	23
科技创新难点在哪？	23
基础研究投入，从政府为主转为多元化	25
让学术造假无处遁形	27
【人才队伍】	29
人才评价不应追求过多“帽子”	29
人才评价，如何摘“帽子”换“尺子”	32
创新中国如何激活人才“富矿”	40
高校非理性人才竞争如何遏止	42
提升工程师培养质量	44
【社会服务】	46
高校如何为国家战略服务	46
科技成果转化 需要平台队伍建设	48
打通科研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49
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瓶颈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51

【报告摘录】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摘录）

2018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三、对 2018 年政府工作的建议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十分繁重。要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展壮大新动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推进智能制造，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中国制造 2025”示范区。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量革命。

（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启动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鼓励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支持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融通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国家科技投入要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强雾霾治理、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使科技更好造福人民。

落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改革科技管理制度，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对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和奖励措施。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要抓紧修改废止；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要下决心砍掉。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人才资源，这是创新发展的最大“富矿”。要提供全方位创新创业服务，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鼓励大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创新资源，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

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打造“双创”升级版。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优质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将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推动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支持企业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加大高技能人才激励，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拓宽外国人才来华绿色通道。集众智汇众力，一定能跑出中国创新“加速度”。

（九）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着力促进就业创业。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运用“互联网+”发展新就业形态。今年高校毕业生 820 多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要促进多渠道就业，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双一流”建设，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继续实施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发展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和网络教育。加强师资队伍和师德师风建设。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成就人生梦想。

报告还在其他地方提到了与教育直接相关的内容：

在“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部分提出：深入推进教育、文化、体育等改革，充

分释放社会领域巨大发展潜力。

在“加大精准脱贫力度”部分提出：深入推进产业、教育、健康、生态和文化等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部分提出：支持社会力量增加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供给。

在“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部分提出：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

在“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粮”部分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文艺创作，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档案等事业。建好新型智库。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在“继续贯彻对台工作大政方针”部分提出：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2018 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解读】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答记者问（节选）

记者：陈部长您好，在今年2月初公布的2018泰晤士亚洲大学排行榜中，中国有101所大学上榜，请问教育部对此怎么看？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推进内涵式发展方面有哪些关键举措？此外，请您介绍一下教育部对于在内地读书的香港学生提供了哪些便利措施和优惠政策？谢谢。

陈宝生：谢谢您，您这是一提三问。关于大学排名问题，可以跟你讲三句话：第一句话，经过这十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发展，中国高校在世界主要排名中位次整体前移，这说明我们高等教育办学的质量和水平已经开始冲刺世界水平，我们办世界水平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阵已经开始形成。第二句话，有101所学校在2017年上榜，这表明我们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随着我们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同向同步同质量提高的。我们走向世界教育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第三句话，对这些排名、这些评比，你可以去看它，去参考它，但是你不要在乎它，它评它的，我干我的。它仅仅是提供了一种观察和分析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角度，在那个角度上，我可以去寻找差距，但是在整体发展上我们要增强自信。这就是我对这些排名

的看法。

尊敬排名，不唯排名，重在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高等学校。你刚才讲的关于我们高等教育发展质量问题，我们是办四件事：一是提升培养能力。学校办得好不好，能力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学校实际上生产的是未来，是人才，为未来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人才培养能力就是学校的生产力。这是我们要办好的第一件事情。二是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适应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我们这个时代大家有很多说法，信息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新的科技革命的时代，这一段时间人工智能异军突起，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这都要求我们对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改革、进行创新。这样我们才能培养承担民族复兴大任的一代新人这样的历史任务。三是要优化结构。要调整优化我们的学科结构、专业结构，让我们的高等教育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你要为未来提供人才，就要紧盯未来，你要为市场提供服务，就要紧跟市场需求。所以就叫作跟着市场调，盯着未来走，把我们结构搞优化。四是要改革体制机制，为培养新时代需要的各种人才提供体制机制保证。总之，改革是未来教育发展

的根本动力，向改革要动力，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谢谢！

记者：去年以来很多高校的思政课有了很大的变化，吸引力也明显增强，请问陈部长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变化的？除了思政课以外，我们还将在哪些方面加强高校的思政工作？谢谢。

陈宝生：谢谢。2016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我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这次会议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是一篇纲领性的文件。我们这一年按照总书记的讲话、按照会议的安排部署，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打了一场提高高校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主要从五个方面攻坚，即思路攻坚、师资攻坚、教材攻坚、教法攻坚、机制攻坚。

一年下来，思政课的面貌大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组织200多位思政课专家到2500多所高校进行调研，随机听了3000多堂课。各省也普遍组织教指委专家、思政课专家去听课，所有的高校都进入了这一次听课、评估、调研范围。这是建国以来思政课第一次拉网式、地毯式的大调研。这次调研我们对3万多名学生发了问卷，就收回的问卷来看，91%多的学生认为从思政课得到了启迪，91.8%的学生表示喜欢思政课老师。这3000多堂课得分都在80分以上，有

些学校的思政课，像春运高铁期间那样一票难求。一些思政课作为慕课推上网络，受到全社会的喜爱，发生了积极的影响。经过一年努力，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但是我们清楚的认识，这些成绩还是初步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正如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加强？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思政观，我们不能把思想政治课和专业课割裂开来，不能让思政课脱离学生具体的成长环境和过程拔高起来，也不能让思政课脱离广大老师，特别是同思政课老师的育人过程、育人实践孤立起来，要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对待。2018年办几件事，概括起来是“几个一”。第一个“一”是要出台一项计划，一项后备人才培养专项支持计划，思政工作思政课要不断有优秀的老师充实到这支队伍里来。第二个“一”是要办一个会。全国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果展示交流大会，检阅一下一年多来具体成果。第三个“一”进行一次专题轮训，对所有的思政课老师轮训一遍。第四个“一”要啃下像教师思政、课程思政、网络思政这样一批“硬骨头”，解决思政课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些难点问题。第五个“一”要建设一批思政课发展创新研发中心，还有培训研修中心。另外在地方和高校建立“三全育人”的综合改革试点，搞一批这样的试点。最后一个是要总结经

验，树立推广一批先进典型和优秀课程。我们 2018 年就抓这几件事，这些事仍然是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攻坚战的内容，攻坚战不可能是一年，我们要多打几年，彻底改变思政课的被动情形。谢谢。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双一流”建设，请问，是否会把资源过多地向“双一流”高校倾斜，对于缩小区域差距，加快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有什么安排？谢谢。

陈宝生：谢谢。“双一流”建设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这是它的主要内容。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一项重大工程，新世纪的重大工程，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大工程。去年，我们发布了首批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名单，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总的看起到了预期作用，现在进展情况是好的。发布之后，也有一些疑问，比如您刚才讲到的资源集中倾斜到“双一流”建设中，中西部高校会不会受到影响，高校的发展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些其他的疑虑。

第一，“双一流”建设是一项非均衡发展战略工程。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工程，就是发挥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优势资源，培育冲刺世界水平的“国家队”第一方阵，增强中国教育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做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制定了类似的计划，像英

国、日本、法国、韩国、俄罗斯，都有类似的计划，所以它是一个非均衡发展。

第二，我们实行这个计划是开放的、动态的、持续激励的计划。就是说打破身份固化。以前一些类似计划，有身份固化这样一个弊端。这本身就给中西部高校打开了一扇发展的大门，因为它不是固化的，第一批你没进去，你可以积极发展培育，以后批次你达到条件了就可以进来，有了上升的通道。

第三，在资源配置方面，我们是把提高和普及结合起来辩证处理的。我们现在用于高等教育事业的投入是 1 万亿人民币多一点，在用于高等教育的总投入里，用于“双一流”建设的占 2% 多一点，它影响不了中西部的的发展。

第四，对中西部我们相应实施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西部高校能力建设工程，开展了对口支援中西部的活动，还出台了部省合建中西部高校的方案。这些都是有利于中西部高校发展的。

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说部省合建这个事。我们有 13 个省、自治区没有部属高校，再加上生产建设兵团，这 14 家是“13+1”。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育部和这些地方一块儿商量，在过去部省共建的基础上搞了一个升级版，建立了一个部省合建这样一个机制，一省一校、部省合建。教育部把这些学校列入部属高校序列，相当于一种准部属高校身份，

省、自治区和兵团对高校现有的支持力度不减，隶属管理不变，我们双方共同合力建设这 14 所高校。在不远的将来，使它能够快速成长为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向“国家队”水平迈进。这就叫做部省合建。这种学校可以把它叫做部建高校，这是一块金字招牌。所以，“双一流”建设只能带动中西部高校的发展，不会削弱；只能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不会削弱；只能促进各级各类高校按照合理布局持续健康发展，不会削弱。所以这个担心是可以放下来了。谢谢。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去年底，国办也出台相关文件，提出了 30 条具体政策。我想问一下，目前这些政策的推进情况如何？下一步，还会在哪些地方重点发力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陈宝生：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其实是起步最早的，福建的马尾船政学堂就是我们最早的职业教育，洋务派办的学校就是职业教育。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原因，职业教育发展比较滞后，近些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的十九大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职业教育作出了总体安排，国务院也出台了相关文件。你关心这个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我可以告诉你，贯彻这个文件、贯彻十九大精神，我们做了三件事：

第一，落实规划。我们出台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并且对这个《指南》设计的任务按部门进行了分解。落实这个规划，面上抓项目，这是全覆盖的，各省各行业都有一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具体项目。点上抓标杆，我们以制造业为主，辐射若干行业、产业，选择了 344 个点作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标杆来培育，从中摸索路子、积累经验。整体抓指导，我们已经发布了 20 个行业人才需求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因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不一样的，要把“需”和紧“求”密结合起来。

第二，搭建平台。我们已经搭建了三个平台：一是职业教育活动周，这是一个论坛型的平台，大家研讨交流。二是产教融合对话，我们举行了 20 多场。这是对话类的平台，产和教相互之间进行对话，衔接需求。三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这是一个竞赛类的平台，每年一期，进行检阅、进行竞赛，营造浓厚的发展氛围。

第三，狠抓质量。职业教育它的重心核心在质量，我们在这一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重点是要解决产教融合中的示范问题、产教融合中的协同创新问题、产教融合中的实训基地问题。我们组建了 1400 多个职教产业集团，联系 3 万多家企业，形成一种紧密的产教融合关系。我们还选择 360 多个学校，建设了一批产教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还和企业

合作建成了 1440 多个实训基地。因为职业教育实训环节很重要，得有动手能力，这是它的质量基础。我们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第一批遴选了 163 个单位，进行现代学徒制试点，试点一年后进行了年审年检，证明这个试点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又遴选了第二批 203 个单位开展试点，现在是 366 个试点单位，叫做现代学徒制试点。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解决“双师型”教师缺乏的问题，在学校和产业、学校和企业之间、产和教之间、校和企之间建立一个“旋转门”，建设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批实训基地，建设一批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来落实好这个规划，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向深度发展。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两件事我觉得需要明确，那就是产教协同，产是支撑，教是核心；校企合作，校是龙头，企是基础。要处理好这个关系，把学校建在产业基地，建在开发区里，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建在需求链上。这样我们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产教协同、校企合作就能取得更大的进展。谢谢。

记者：去年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习近平总书记还发了贺信，我们注意到包括北理莫斯科大学已经成立了多所中外合作办学大学，陈部长能否请您介绍下一步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考虑？谢谢。

陈宝生：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两

国元首确立批准的一个教育合作项目。去年举行了开学典礼、建成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发了贺信，普京总统发了贺信，这是中俄两国教育合作的一个新尝试、新成果。目前进展情况是好的，建设过程当中的合作是愉快的。中国政府对中外教育合作历来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这 40 年，我们的教育就是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走向世界的。我们的方针历来是“请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的教育。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和一些国家合作已经在中国办了一批教育机构，经中国教育部批准，我们已经办了 2600 多个办学机构和项目，其中 1324 所是本科以上学历层次。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种合作，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互利互惠，让中国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外一些学校的优质教育，让国外的合作者在中国合办的机构里和中国合作者取长补短，领略中华文化，培养双方需要的各类人才、双方合作的友好使者。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要“请进来”。“走出去”，我们这些年也加大了步伐，现在我们在国外合办了一批教育机构，发展情况也是好的，下一步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加快发展步伐。谢谢。

原文刊载于《新华网》

2018 年 3 月 16 日

改革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访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节选）

砍掉有碍创新的繁文缛节 让激励政策更活更有“利”

记者：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王志刚：必须要让科技人员沉下心来，认真地做研究。让这些坐冷板凳的人，让这些长期从事于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并且可能一辈子出不了科研成果的人，能有一个安心的环境；在技术创新方面，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结合在一起，政府负责构建好的平台、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提供好的服务；在资源引导方面，我们要考虑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国力的综合提升和竞争力方面，在我们的国家安全和老百姓获得感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科技如何能更好地把资源聚焦过来。

科技体制改革还是围绕人来改 挖掘好世界最大的人才“富矿”

记者：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王志刚：科技体制改革还是围绕人来改，怎么样能够让科技人员有积极性，有一种热情，甚至有一点“苦行僧”一样的状态，讲到科技就兴奋。政府就是

要通过改革，保障这些愿意投身科技、能够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的科研活动能够心无旁骛，并且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赞誉。

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好 向科技要力量

记者：今年，科技部工作重点有哪些？

王志刚：2018年我们首先要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好，这是一个总体的顶层设计。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干什么、谁来干、以什么样的组织系统、各个主体相互关系、围绕什么样的目标来干，体系性的问题要先回答。另外，科技本身有自身的规律。我们为什么要抓科技？一是要向科技要规律，第二是向科技要力量。这个“力”怎么要？我们必须把科技本身的规律弄清楚。科学如何转换成技术、如何成为生产力和动力，这都是科技部和广大科技人员需要回答和发挥作用的地方。

原文刊载于《新华网》

2018年3月14日

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新动员令

——访原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节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特别强调“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双一流’建设，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这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动员令，是高等教育最紧迫的战略任务。

围绕十九大报告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原教育部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

完善“双一流”评价“中国标准”，构建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长效机制

记者：去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全面启动“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随后公布。“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有哪些关键环节？

杜玉波：“双一流”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加快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和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都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对“双一流”的认定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建设。“双一流”建设从方案设计之初就强调不是终身制，不

是固化的，要根据建设情况进行绩效评估。这种管理和支持机制的目的就是推动建设高校拿出成果、有所作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因此，必须构建支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长效机制，引导高水平大学持续健康发展，其中科学评价是核心问题。

记者：科学评价问题应从哪些方面着眼解决？

杜玉波：建立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是国内外高等教育的一个共同难题。中国特色的“双一流”评价体系，首先要扎根中国大地，在适当借鉴国际经验和指标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建立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的“双一流”评价体系，引导高校把中国特色跟世界一流目标融合在一起，着力解决好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其次要突出服务国家需求、强化实践标准、淡化数字化指标导向，突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评价。还要聚焦人才培养质量，坚持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评价导向，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根本使命。

坚持服务导向，大力提升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记者：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同向

同行是高等教育的使命。近5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成效如何？

杜玉波：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高校共培养了3400万名毕业生，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项目接近全国总数的五分之四，发明专利年授权量超过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多个领域产出了一大批服务国家急需、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也应当看到，面对中国制造2025、健康中国2030、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产业发展战略需要，面对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建设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需要，高校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加主动地支撑产业布局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抢抓机遇、超前布局，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高对区域发展的支撑和服务能力。

记者：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杜玉波：我建议，一是建立完善高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学科专业机制，进一步推动高校形成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机制，科学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增强学科专业与市场结合的紧密度。二是大力健全协同育人、科研育人机制，推动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广泛实施产学研合作育人，汇聚社会资源支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

三是大力增强高校创新服务能力，探索实施高校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行动，谋划国家实验室、国家创新中心、临床医学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在高校建设布局，进一步支持高校建设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和大成果。

提升中西部高校发展内生动力，优化高等教育战略布局

记者：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实施5年以来，中西部高校与东部高校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在实践中，中西部高校还面临很多困难，您如何看待这些困难？有何建议？

杜玉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中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关键在人才。中西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主要依靠中西部本地高校，必须把中西部高校发展放到国家高等教育的战略布局中予以重点考虑。我建议，一是规范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国家层面出台意见，进一步引导高校在人才竞争中突出国际视野，突出“高精尖缺”的导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人才支持计划应当进一步加大向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西部、东北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倾斜的力度。二是加大东部高校对口支援中西部高校力度，更多安排东部高校一流师资、一流学科平台、一流教育资源与西部高校实现共享，真委派专家、真拿出技术、真提供平台，确保取得实效。三是优化中西部地区高水平

大学建设布局，在部省合建中西部高校的基础上，站在优化国家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把对中西部高校的支持和资源倾斜落到实处。

把地方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依靠力量，为地方高校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记者：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地方高校扮演怎样的角色？发展情况如何？

杜玉波：目前，地方高校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比例超过95%。不管在规模还是发挥的作用上，地方高校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支撑。但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长和各方面资源条件限制的影响，地方高校发展普遍面临一些困难，影响了地方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的充分发挥。

记者：如何破解这些发展中难题？

杜玉波：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大背景下，各地应该把支持地方高校发展摆到增强当前和未来区域发展动力的高度上，帮助解决难题、克服瓶颈，加快提高水平。一是加快落实“放管服”，建议各地尽快提出“放管服”的实施细则，同时加强科学监管、优化服务，让“管”和“服”两个轮子都转起来，帮助高校把办学效益更好地发挥出来。二是加大对地方高校的经费支持力度，结合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参照中央高校生均拨款系数，实施地方公办普通高校生均财政拨款基准定额，探索建立以绩效评价为基础的学科专业建设长期支持机制，建立地方公办高校稳定的经费拨款制度。三是加速推动地方高校产教融合发展，以产教融合为导向，引导地方高校更主动对接产业需求，加快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院校转型，真正做到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联动，同时将一些“点”上的经验模式化、制度化并做好推广。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释放高校发展活力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放管服”改革摆在重要位置着力推进，为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政策遵循。改革推进情况如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杜玉波：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改革的空白点、盲点、堵点。陈宝生同志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减法”要继续、“加法”要创新、“乘法”要加快。我认为，要真正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一是把该放的真正放到位。针对高校反映比较多的编制、岗位管理、进人用人、职称评审、基建审批等“老大难”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对准问题，瞄准需求，消除“堵点”。二是把该管的真正管起来。改革监管机

制，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用好信息公开等社会监督手段，探索建立高校依法自主定规则、政府监管落实、违规者退出的新机制。三是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简化优化服务流程，建立基于数据分析的监测机

制、科学的监督抽查制度和教育基本质量监测体系，让高校教学科研人员从过多过苛的要求、僵硬的考核、烦琐的表格中解放出来，为高校办学、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新闻》

2018年3月8日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石建勋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做好今年工作，要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和根本要求。只有深刻理解这个根本要求，才能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加快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科技发展成就显著，一些重大科技成果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实力还不相称，与经济建设主战场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还不适应，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创新机制、创新实力和创新能力方面都还有一定的

差距。因此，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重点突破。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做好国家战略科技和创新链的整体布局优化。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格局重塑中，创新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依靠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挖掘发展内生动力。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努力为高质量发展重点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启动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重点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能力、善于集成创新资源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以最佳的比率和最快的速度实现技术创新的

转化应用。

把人才作为支撑科技发展的第一资源，壮大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人力资源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人才资源，这是创新发展最大的“富矿”。要提供全方位创新创业服务，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鼓励大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创新资源，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推进创新教育，进一步优化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环境，加快推进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集众智汇众力，推动形成中国创新的蓬勃之势。

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科技创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支撑引领作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实体经济的重点难点都在于制造业，要实现中国制造的跨越，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升级。要重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协同，顺应信息化大潮，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争取向智能制造转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培育世界级制造业集群等核心品牌力量，促使我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实现整体跃升。

原文刊载于《新华网》

2018年3月14日

【“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必须有中国特色

自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双一流”一直是牵动众多高校目光的关键词：2017年9月，“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2017年岁末，众多入选高校纷纷公布自己的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双一流”建设正式破土动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双一流”建设，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代表委员们对“双一流”建设的关注及思考愈加深入。

彰显中国特色与民族复兴同向同行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代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应培养一流人才、汇聚一流学者、产出一流成果、作出一流贡献，在国家战略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他认为，“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办学方向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广大师生的头脑；二是在立德树人上，坚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引导学生把服务国家和人民与实现人生理想结合起来；三是在服务国家战略上，探索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同经济社会发

展更加紧密结合的机制；四是在文化自信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涵养大学文化，培育优良的校风学风。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委员：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高校，应是人才培养的基地，科技创新的源头。”今天，强调“中国特色”，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大学的责任与使命：“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实现从追赶到超越、从借鉴到自主、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这不仅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飞跃。我们应登高望远，看清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看清国家、社会、教师和学生的长远需求，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同向同行。

中国特色，是使命，是担当，更是独特的发展优势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邹晓东代表：从全球经验看，在较短时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不乏成功范例，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我国的香港科技大学等。其共同特点都是保持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持续聚焦重点方向并取得了关键突破。同样，在中国建设‘双一流’，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加快奠定核心竞争力。

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委员：“双一流”建设不仅仅是资金、资源的分配，更是对一个大学的办学理念、学科方向的提

升和凝练。对于一个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其本身的文化，以及特色和特长。大学应将自己积累的特色和特长与国际前沿的重大科技问题、科学问题紧密相连；或者适应国家的重大发展需求、承接国家重大项目；或者开发关键技术等，这些都是“双一流”建设所需要的。

建立中国标准服务国家为首要任务

近来，几大世界大学排行榜相继发布，中国大学取得了亮眼成绩。但也有声音指出，这些排名的指标体系主要考虑学术因素，在评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方面有所缺失。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代表：不同的世界大学排名体系都有其自身方法论的考虑。我们要关注目前国际上一些大学和学科的评价体系，对其反映的一些趋势性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但绝不能简单盲目照搬和复制，跟着这些评价指标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引导大学以服务国家为首要任务，把关注点和重点放在衡量人才培养成效，衡量大学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创新竞争力提升、对行业企业技术进步等的实际贡献上。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邹晓东代表：在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评价上，除了一些常规评价指标外，更应突出服务导向，如对学校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战略部署情况、对学生到国家急需的重

点区域和重点行业就业情况等评价；突出贡献导向，如可考察高校产学研重大平台建设、智库建设、社会服务和成果转化效益等情况；突出责任导向，如可考察高校落实援藏援疆等对口支援任务、完成精准扶贫任务等情况。

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委员：要把文化传承作为发展的使命，以长远的眼光、历史的视野，审视一所大学对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以及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要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立德树人，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要特别强调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础在本科。没有高质量的本科，建设一流大学就缺乏根基。必须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评价导向。

李言荣委员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还应该实施分类管理。举例来说，一些行业特色类院校，往往会有几个专业或学科排名前列，但按照综合性大学的评价指标评价，排名自然不会靠前。因此，要基于我国现有高校类型，分为综合性院校、理工科院校、行业特色类院校等，每种类型都应该根据自身特点设立相应评价指标，不应让所有院校依照同样的指标排名。

贡献中国智慧 将“人”作为关键核心

邹晓东代表坦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上，还面临多重

挑战：一是政治站位有待提高，主动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开展战略谋划不够；二是聚焦一流的意识有待增强，办学治校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三是深化改革的难度增大，必须‘啃硬骨头’‘打攻坚战’；四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面临挑战，高水平大学的收入渠道还需要进一步多元化，办学支出要适应市场化要求，特别是高层次人才薪酬制度要逐步与世界接轨。

此外，李家俊代表认为，中国高校在教师队伍、科研创新、国际影响等方面也存在短板。比如，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学者还不够多，不同学科人才差异化明显，教师队伍的整体活力有待激发；具有重大原创性的理论和科技成果偏少，多学科交叉集成的内生动力不足；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不够紧密，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水平有待提升等。

挑战当前中国大学该向何处发力？

宋纯鹏委员将解题的关键放在了“人”上。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具有‘国际视野、本土意识、中国情怀’的一流师资队伍。一流师资队伍建设需要“引进”与“培养”并重，既要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人才，又要注重以培养为核心，大力推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学缘的教师交流融合。

李言荣委员则认为，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还要坚持以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为动力引擎。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不是面向国际学术前沿，有没有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重大问题，是不是跟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如果做到了这几项，学校的科研水平自然就上去了。川大正在实施一个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一方面要面向学科前沿或重大工程的共性基础，点亮新的科技创新增长点；另一方面要构建‘人才—方向—平台—项目—成果’创新链，实现用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厦门大学校长张荣代表认为，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本载体和重要依托。在一流学科的建设当中，要坚持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坚持内涵发展，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第二，特色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三，融合发展，促进交叉，优化生态，努力打造更加科学合理的一流学科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委员认为，推进“双一流”建设，要努力构建具有良好引领作用的评价体系，包括人才体系、学科评价体系、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等等。我们需要在探索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的标准上下功夫，包括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这个标准要考虑到本土、民族、社会发展，也要考虑到国际比较和对外开放，努力的方向就是

如何实现国际化和民族化的有机统一。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代表：高校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有层次的，可以归纳为服务发展、支撑发展、引领发展三个层次。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局限在对社会有用，而是要引领发展，至少要起到支撑作用，比如科技创新应该聚焦在原始创新。这样，高校所做的工作才不是跟跑的工作，而是领跑的工作，这才是一流大学该做的事。

与国际接轨，学科划分可再“粗”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代表：入选“双一流”是南京邮电大学历史性的战略机遇，不过面临不到3年的新一轮评估，杨震校长坦言压力很大！杨震告诉记者，“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名单在认定工作流程上实现重大突破——不组织高校申报，不需主管部门推荐。“离新一轮的评价时间不多了，希望国家能公布更细致的评选标准，或进一步地引导，明确一流学科的发展目标。”

杨震校长建议国家教育部门可重新考虑“学科”的划分。关于学科划分的标准，国内外差别较大。按学科分类排行的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对大学学科划分只有22个，划得很粗。当然这一划分可能过粗，然而国内高校把学科划成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光一级学科就有110个，学科交叉融合是大趋势、大方向的背景下，划分可能又过细了。

“科划分某种程度上是知识体系的划分，在知识融合交叉度越来越高的当下，我们能否研究、明确一套符合国家经济发展需求，从实际情况出发科学的学科划分标准，为学校一流学科建设指明方向。

能否打破教授晋升的名额限制？

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代表：为适应一流学科建设，应让高校那些仍处于僵硬状态的机制体制尽可能“活”起来。要建设一流的学科，需要吸引、培养一流的名师。去年江苏下放了所有本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一方面提高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另外一方面通过精准的措施改革，激发了各个层次各类教师的积极性。但是职称晋升中还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研究型大学教授高级职称占比的问题，高校正副教授的名额有一定限制，我们对正副教授的比例也有规定。需要花些精力来进行改革。实际操作中，教授晋升的比例相对僵硬，想让更多教师晋升为教授，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学校面临着很多难题，比方工资总量的控制、绩效控制，假如职称比例改变，基数会发生重大改变，相关的政策也得跟着变。教授数量增多后，课程设置上也出现了变化。此外还要考虑到青年教师的培养问题，其中包括了许多配套的系统性的改革。

创建“双一流”应避免同质化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代表：创建“双一流”应当避免盲目攀比、同质

化发展，为“双一流”所创建的时间表也应当留有余地，因为是否达到“双一流”还需要国际认可。国家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写入“十三五”规划，作为一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是有重大利好的。他认为，建设“双一流”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明晰的办学目标，避免学校之间的盲目攀比、同质化发展；还要有科学的治理结构，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要有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现在教育内在的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要有非常精良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包括加强教师队伍、学术规范和管理队伍建设。

钟秉林认为，和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转换办学观念。另外，人才培养方面、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国外有很多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当然，我们中国高校确实也有我们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但最后成功与否，需要在一个比较科学的标准之下进行检验。

原文刊载于《新华网》

2018年3月11日

寻找“双一流”大学的气质和品格

——访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王树国

一所大学的气质和品格是什么？

自2015年底被提出至今，“双一流”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界人士思考未来发展时，所面对的最大命题。在这个宏大命题下，一所伟大的大学应该具有什么气质和品格，成了大学校长的“必答题”。

在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看来，一所大学的伟大之处，不只在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取得了多少科研成果，更在于这所大学有没有自己的内涵和精神。

王树国说：“大学是先进思想和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应该摒弃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沉下心来主动思考国家提出

‘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和意义，聚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留下历史印记的贡献。”

一流大学要不忘初心，主动融入社会

“办教育的人一定要跳出教育看教育。教育要走在社会前面，引领社会的发展。一个社会、民族要实现现代化，教育必须先行。”在王树国看来，这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实现目标领先于国家现代化的原因。

“办大学不能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王树国说，一流大学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这颗初心是为人民办大学，为中

华民族办大学，为推动社会进步办大学”。

第四次工业革命“鼓声渐隆”，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为大学校长，王树国充满了危机感：“现在有哪些新的产业形态是源自大学？很少。很多颠覆性技术也并非出自大学。”

21世纪将会是一个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技术更新越来越快的时代。王树国说：“原来一项技术可能支撑100年，现在可能几个月就会更新迭代。因此，大学一定要有危机感，要主动融入社会之中，密切关注社会发展，按照社会的发展需求来强化自身内涵建设，进而引领社会的发展。”在这样一个知识共享的时代，大学何为？

2017年，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共建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已经全面封顶，这个总占地面积5000亩的创新港定位于打造面向全球的科教重镇，旨在建成“一带一路”的创新源头、西部发展的智力引擎、人类进步的精神宝库。

在为其命名时，西安交通大学并没有将其命名为新校区，而是命名为“科技创新港”。王树国解释说：“港是开放的，是有进有出的，而‘区’和‘园’都是有边界的，这个港口的使命是让大学成为高端人才、创新成果和先进思想的集散地。”

王树国说：“西安交通大学致力于探索21世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形态，通过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建设，

让大学成为一个培养一流创新人才、产生一流科研成果的教学科研‘新高地’，一个实现科技资源统筹、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驱动‘新平台’，一个以国际化示范基地和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依托的社会服务‘新纽带’，一个海内外优秀人才集聚并释放才能的高端人才‘蓄水池’。”

一流大学要牢记使命，引领社会进步

“办一流大学要有自信。”王树国认为，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高校要昂起头来，不因各种评价和排行榜迷失自我、失去方向。“大学牢记使命，回归本源，不要被眼前的名利所迷惑，要稳住心神，真正按照大学教育的客观规律去做好自己的内涵建设。不仅要充分关注被国际广泛接受的客观指标，还要坚持立足中国大地办大学，‘走有中国特色、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的发展之路，才能实现弯道超车’。”

“大学是需要精神的。”在王树国看来，真正一流的大学是涵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的大学。

因此，王树国建议，中国高校要做好“双一流”建设需要一次彻底的思想革命：不仅要有世界的思维、系统的思维和创新的思维，更要牢记大学的使命责任。建设好“双一流”必须将中国的问题纳入世界大环境中去思考，要敢于引领社会发展和世界进步。

如何建设一流大学？2016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对于这“三个面向”，王树国深以为然。王树国认为，我们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都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三个面向”，必须“站在全球的视角、站在建设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大学自身的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世界进步的大格局中，让大学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引领者。

“后配给”将带来一流大学新气象

这两年的全国两会，来自高校的代表很关注一个话题——高校人才流动。中西部高校更有“切肤之痛”，因为一流师资、一流人才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为“挖人才热”降温，王树国建议：“我们的高校评价方式要进一步完善，避免引起高校过分关注某些人才指标。”

王树国认为，对于大学的评价要以贡献论英雄，以产出论英雄，同时也要关注投入产出比。

西安交通大学正是总结了之前资源分配方式的一些经验，自2016年起，在不同学院的资金分配上，实行了“后配给”制度。

“在此之前，各学院的经费需要每年提前向学校申报预算，再由学校进行

论证来确定，学院按照论证后的计划实施。但‘后配给’制度则是学校根据各学院上一年的工作业绩增量，以及各学科与国内兄弟高校学科的增量对比，下拨相应的经费到学院，这笔钱完全由学院自主支配。”王树国说，这一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引导各学院不再专注于每年可以得到多少经费，而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将本职工作做好。

“每个学校的学科基础不同，发展条件也有差异，因此很难用一个标准衡量，这是我们评估体系所遇到的最大难题。”王树国说，而“后配给”制度不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高校。“文科类大学可以讲他们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贡献，理工类高校可以讲他们在理工领域的贡献，只要讲出来，就能获得相应的资源。”

“是英雄是草包，战场上见。”在王树国看来，如果在高校之间施行“后配给”制度，能引导高校将主要精力放在适合自身发展的内涵建设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挖人才热”降温。“按照投入产出比，就有可能出现虽然没有院士，但是做出了院士级别的成果，也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和资源配给。这会让大家更理性地看待‘帽子’，也会引导大家多作贡献。”

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报》

2018年3月14日

中西部高校如何搭上“双一流”快车

“在一个不发达的省份，建设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要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在近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委员这句话一经说出就在与会者中引发了强烈共鸣。

人才竞争空前激烈、资金缺口大，传统优势学科面临东部高校强势赶超，新兴学科建设又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持。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如何保持原有优势，进而搭上快车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中西部地区高校一道急需求解的题。

老问题遇到了新情况

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委员：这是一个老问题，但现在又遇到了新情况。”谈到中西部高校面临的挑战。“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各地都迎来了新一轮增加高等教育投入的热潮，而东部省份的投入增量远远超过中西部省份。张炜说，尽管中西部省份有的在支持本地高校‘双一流’建设上投入资金占财政支出比例还高于东部省份，但捉襟见肘的财政使多数中西部省份高校得到的资源仍然远少于东部高校。“事实上，中国高校的整体世界排名与几十年前相比有了大幅度提升，中西部地区高校并不是没有发展，但跟发达地区高校比确实还是慢了。他以不久前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举例。尽管中西部很多高校的学科总体排名还在之前所处的

梯队，但具体到单一学科层面对排名进行分析，东部高校集聚效应更加明显。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委员提醒：中西部的建设人才，主要靠当地高校培养，地方经济振兴、转型发展，中西部高校是主战场，而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产业升级转型方面，中西部地区还是要依靠当地高校，中西部高校担子重、压力大。要重视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意义。

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魏世忠委员：对中西部建设而言，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比直接向中西部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取得的效果会更好。

发展关键在于留住人才

在谈到西部高校面临的人才压力时，东北大学校长赵继委员感同身受。同时他认为，高校至少可以先努力把自己的小环境打造好，我的体会，优秀人才还是更看重发展机会和研究平台。事业留人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弘扬和继承老前辈的精神，不过也应该看到，“西迁人”之所以能扎根大西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国家的战略布局使然，他们的事业平台就在那里。”张炜说。

李言荣：当前人才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人才流动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反对那种直接抱人家正在下蛋母鸡的做法。一些人是因为待遇流动，还

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平台流动。中西部高校都有优势学科，而且与行业联系紧密，如果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进行指导和调节，中西部高校会发展得更好。

如何从国家层面进行人才调节？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委员建议，统筹设立一些专门的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比如，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设立西部专项，单列指标评审，岗位设在西部高校，要求参评者有一定在西部工作的年限。这样，可以稳定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进而可以吸引一部分东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到西部工作。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委员：现在人才竞争激烈，西部高校给出的物质待遇普遍比东部沿海地区低，有些高校花了大力气培养的人才，一到了要出成果的时候就被挖走了。建议由国家针对西部高校联合地方政府成立人才专项联合基金。除学校给特别薪水待遇之外，再由专项基金为人才补给与东部沿海高校相匹配的差额部分，让本来愿意到西部工作的人才，不会因为待遇问题而最终选择东部。这样，学校落实一部分待遇，国家提供一部分补助，既可以减轻学校负担又能促进人才队伍稳定。

激发内生动力是治本之策

在魏世忠看来，尽管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中西部高校同样有自己的优势。很多中西部高校有自己的特色学科，与当地行业企业联系紧密，在解决地方和

区域经济发展关键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魏世忠介绍，河南科技大学与中铝洛铜、中信重工、洛轴集团等国家在中部地区布局的大企业合作紧密，为当地经济发展、企业转型升级作出了突出贡献。近5年来，我们获得了6项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都是与这些企业联合研发的，而我们的产品也广泛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于矿山开发、余热发电、交通建设等。

四川大学也与当地政府合作密切。川大响应中央扶贫号召，面向地方经济主战场，利用专业优势支持成都市新经济转变，支撑成都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而成都市也积极支持川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签订了共建协议。

严纯华认为，中西部高校要突破阻力更好发展，首先要苦练“内功”，激发内生动力。特色化、内涵式发展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努力提升自己，在机会到来时才能抓住。“由于当初国家的布局，很多中西部高校所在城市都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其中也不乏高校的校友，这些单位都是可以合作的对象。高校有自己的特色一定要坚持做好，在多元化发展中守住自己的特色，栽好自己的梧桐树，自然能引得凤凰来。

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报》

2018年3月8日

【科学研究】

科技创新难点在哪？

——访原科技部部长万钢（节选）

主持人：科技创新难点在一个一个的解决，比如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科研人员松绑、赋予科研人员更多的权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有体现。想问您科技创新最硬的“硬骨头”是什么？

万钢：当前科技创新最硬的“硬骨头”在于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这两个环节。原创力不是靠人指挥能指挥出来的，要靠科学家的奇思妙想，也要靠科学家的淡泊名利，十年磨一剑。所以在技术路线的选择、科研经费的使用、科研管理等方面，要为科学家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只有科学家觉得环境宽松了，他的思维也就宽松了，奇思妙想就出来了。

在促进成果转化方面，要赋予科技人员更大的自主决策能力；要落实好科技成果转化的各项政策；要做好转化过程中的服务；要解决好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让企业和高校院所能够深度地融合；还要注意发挥青年人创新创业、勇往直前的精神。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找到最佳切入点、最佳应用场景和最强的市场需求，来实现个人梦想，也为全社会的创新添砖加瓦。

主持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样抓住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机遇，引领世界的科技创新潮流呢？

万钢：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砥砺奋进，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同样，科技也离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越来越近。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整个世界都是前进的，主要国家是有先发优势的，所以竞争和合作是必然存在的。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既要登高望远，又要有忧患意识。

登高望远就是要谋长远、强基础、增实力、促转化，在各个重要领域都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全国的科技人员要更加努力、更加深入基础，解决好制约我们发展的科学问题；企业的科技人员要寻找前沿当中的未来市场，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生产出更高质量、更满足需求的产品，走向世界。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要与产业、企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的实力才能够有所提升。

忧患意识就是需要我们居安思危，现在有好的形势，也要看到我们的短板、弱项和问题。科技管理人员要深入到群众身边、深入到科研机构、深入到企业

发展的一线，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制约科研人员发挥积极性、创造力，解决不协调、不配套、难以落实的问题。

此外，还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优化投入结构、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国际科学合作、产学研深度融合、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科技惠民方面要积极深化改革，保持一种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去解决一些制约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

主持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科技创新如何聚焦到这个主要矛盾的转化，让老百姓有更多的科技“获得感”？

万钢：最重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创新，要考虑到在新时代人们最期望的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使科技创新以人民为中心，那就要知道人们的需要是什么。

最大众的需要就是社会的安全。防范各种风险，这是人们最需要的诉求。人工智能、数字化社会，这些建设都可以使他们更加便利、更加安全。

脱贫攻坚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科技精准扶贫脱贫要做什么？就是把最先进适用的技术教给贫困地区的农民，我们叫“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富”。用智力扶贫的办法，使长效脱贫机制能够发挥作用。

大家关心的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污染治理，一方面要做好污染的检测、防控、处置工作；另一方面，要用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来替代产生污染的产业，比如说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天蓝了、水清了、山绿了，那人们就觉得舒适了、幸福了。与人们息息相关的问题还有健康和卫生。怎么样做好传染病防治，怎么样去针对像癌症、心血管病、肝炎这一类的疑难症，怎么样能够使人们得到预防性的检测，比如说基因检测、现代化诊疗设备，使人们得到及早防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加强全民体育素质的提高。全民健身，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装备、环境、指导，这都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应该率先去研究、去使用、去垂范的。

主持人：进入新时代，科技创新又会面临什么样新的形势？又肩负着什么样新的历史使命呢？

万钢：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按照十九大要求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面向这些目标，给了我们很多新的着力点和发力方向。

首先，要登高望远，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和变革的快速发展。要紧紧地抓住强基础、促转化，在未来“三跑”并行的情况下，使科技创新向领跑并行的领域进军。在一些重大关键领域，

要实现差异化的竞争策略，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超越点，走向世界的前列。

建设第一个百年目标的“硬骨头”就是脱贫攻坚，要发挥智力扶贫的作用。进入新时代，高质量的发展是未来的重点，使质量和效益双提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出力。

做到这些，很重要的是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落实好各项政策，最大

程度地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发挥科学家精神，鼓励企业家精神，鼓励青年人创新创业的精神，为科研人员创造宽松的创新环境，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同时又不怕失败、勇往直前地去实现自身的目标，实现国家发展目标。

原文刊载于《新华网》

2018年3月13日

基础研究投入，从政府为主转为多元化

——科技界联组会热议基础研究改革

科技界的小组讨论中，“基础研究”一直都是热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更让委员们激动和期待。

3月6日的科技界联组会议上，中科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朱日祥委员发言建议需要有一些政策的引导，让社会和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研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研究，这几天在科技界的讨论中被多次提及。实际上，在朱日祥被确定为联组会的发言人选之后，他组内的多位委员都找到他，希望他能在发言里“提一下这个事”。

结构有问题，民间资本投入不足

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但它又存在周期长、难度大、高风险等现实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基础研究的投入一直是科

学家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不少委员认为，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差距，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中科院院士饶子和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徐世杰委员等都曾多次呼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如何让更多的资金进入基础研究，一直是科技管理部门和科学家们努力解决的问题。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表示，我国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资金财政占比其实跟美国联邦政府相差并不多，但两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总额差别巨大，主要原因在于投资结构的差别。美国除了联邦政府的投入之外，州立级财政会有相应的投入资金，更重要的是，企业和基金会等民间资本也会对基础研究进行持续支持。但是我国基

基础研究主要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地方及企业所占比重极少。正是这样的差别，才有了大家感受到的“中美两国在投入上差别巨大”。

资本有愿望，但有些问题还没理顺

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的民间资本已经有了进入基础研究的强烈愿望。红杉资本中国创始合伙人沈南鹏是今年新任的政协委员，他正是在科技界别。在小组讨论的第一天，他便表示自己一直在关注基础科学的发展，希望下一步国家能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支持机制。“在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上，除了政府的稳定支持，民间资本应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要鼓励民间捐赠，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企业家拿出资金支持基础研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为国家排忧解难、作出贡献。

2016年，沈南鹏和其他几位企业家一起设立未来科学大奖。这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个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关注的正是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网易 CEO 丁磊委员亦是未来科学大奖的出资人之一，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支持和认同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研究，而且自己已经在做相关的事情，但他提出，希望这些项目本身要公示，项目的成绩也应该被公示。希望这些成果为全社会共享，而非单属于某个企业。

政府有想法，引导政策或将出台

实际上，从早些年开始，科技管理部门就在思考基础研究投入多元化的问题。

今年1月3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作出部署，对许多基础研究管理中存在的“顽疾”都提出了解决方案。《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要坚持五大原则，最后一条便是强化稳定支持，优化投入结构。这让吴季对基础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他也表示，在强调自发性兴趣基础研究的同时，也要强调有组织的大型项目。吴季建议，加强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希望政府部门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如果要实现科技强国，必须有科技前沿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大多是长线的。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表示，科技部正在做《意见》的落实工作。对于大家关心的投入问题，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案，科技部对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体系也做过调查研究。针对基础研究重大目标，科技部将牵头建立“部省联动机制”。针对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研究的问题，将建立政策引导机制，下一步，将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企业和基金会支持基础研究的财税政策。

原文刊载于《科技日报》

2018年3月9日

让学术造假无处遁形

科学研究是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事业，科研诚信是从事科研活动应该遵守的基本价值。自 2015 年 3 月起，英国现代生物（BMC）、斯普林格（Springer）等国际出版集团 4 批集中撤稿，涉及到中国作者论文 117 篇，给我国国际学术声誉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一年多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对其中涉及科学基金资助的 28 篇论文开展了详细而深入的调查。调查发现，第三方中介机构论文代写服务的“灰色产业链”已形成，其制造的新型造假难以被人发现。

2017 年两会期间，学术造假依然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让学术造假变得不明智、不可能，捍卫科学道德的初心始终不移”，成为代表、委员们共同的心愿。

科学基金率先垂范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杨卫院士：调查中，基金委发现这些被撤论文都是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润色”并投稿；更有甚者，部分论文完全是通过论文买卖，请人捉刀代为撰写和投稿。第三方中介机构论文代写服务的“灰色产业链”已形成，新型造假手段难以被人发现。

针对当前科研诚信问题所呈现的新形式、新问题和新的挑战，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永远在路上。

基金委多年来通过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和惩处并重”的科研诚信建设体系。多年来始终坚定捍卫科学道德的态度，一直将严肃查处科研不端行为作为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

未来，基金委将从自然科学基金监督的角度率先垂范，做好常态化、制度化、信息化及国际化等方面的工作。例如，在项目申请、评审与绩效考核等过程中，科学基金将加大科研不端行为和相似度检查力度，实行科研诚信问题“一票否决”。

在制度化方面，科学基金将加强科研伦理研究和制度建设，注重从被动式接受投诉举报转向主动式体系设计与实践。在信息化方面则将建立科研诚信举报网站和数据分析系统，积累结构化案例库，为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和警示教育提供参照。维护科研诚信，优化学术生态，是一个系统工程，路漫漫其修远兮。

李鸿委员：评价人才应多样化

对于新型学术造假的现象，委员们认为，究其根本，仍然应该追溯到追求论文、成果数量的“指挥棒”。“评职称需要发论文在核心期刊，而一线工作者没有时间写论文，这样的需求催生了第三方灰色产业。”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某部工程师李鸿说这就是“学术界 GDP”。

多年来，全国政协会议科技组讨论会上，“学术界 GDP”已经饱受诟病。不过，在委员们看来，近十几年来，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李鸿看到，现在哪个单位来汇报依然是说有什么学者多少名、获了多少国家奖、发表了多少学术论文，科研一旦趋利，必定会掺杂行为不端。

促进人才评价的多样性也许能够成为解决“学术界 GDP”难题的有效途径。在委员们看来，既然科学研究的类型有很多，就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来制定标准。例如，实践性较强的工作的评价，对人的评价应当依据科学家在项目中作出了什么创新性的贡献。而对于基础研究的评价则应注重其探索性，容许其失败。

苏国萃委员：期待多管齐下树新风

在委员、代表们看来，学术不端并非仅仅是科技界的事儿，而关乎整个社会的风气——诚信。因此，要让学术不端行为得到遏止，离不开社会共治的多管齐下。

提到学术不端，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苏国萃回忆起自己的亲身经历，申报材料“注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申请职称、项目、奖励，甚至院士评选时，许多人都会任意把自己研究水平抬高。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起初大家对这样的行为深恶痛绝，但全社会诚信的缺失，竟然让大家对此持有习以为常的态度。

“现在有些学者太浮躁，真解决起来很难。”苏国萃指出。由于学术界出现这种现象时间比较长，要转变大家“见怪不怪”的观念及氛围，提倡坚持职业操守，形成诚信的风气。

对此，在历年政协会议中，委员们都认为，首先，除了评价体系外，政府应出台政策、采取一些措施加强事前、事后的监督和惩罚力度。同时，媒体也应在重建诚信上有所作为，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曝光力度，宣传倡导全社会形成重视诚信的风气。此外，针对学术不端立法也是委员们经常呼吁的主题。

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出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讲话中指出，弘扬学术道德和伦理道德，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

原文刊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8年3月10日

【人才队伍】

人才评价不应追求过多“帽子”

人才评价不应追求过多“帽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吸引大批科技前沿人才回国。与此同时，我们制订了不少人才计划，有些是同级别的不同部门制订的。这些计划固然能够对人才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也会加剧内培外引的人才对这些“帽子”的过多追逐，有的人年纪很轻，但已经戴上了好几顶“帽子”，其实有一顶同量级的“帽子”就已经证明了水平。目前，不少归国人才也加入到争夺这些“帽子”的行列中，他们更需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做研究、搞科研，而不是将时间精力过多地浪费在这些方面。

这其实反映了在人才评价的问题上，我们究竟是应该重“质”还是重“量”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人才评价必须要以质量为主。而要避免出现人才评价过于追求“帽子”数量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分类。一个人如果要申请其他的“帽子”，首先应该确定之前是否有相同级别的“帽子”。如果已经有了，就不允许其再申请同级别的“帽子”，而是鼓励他专心于科研，从而早日有实力申请更高级别的“帽子”。

以四川大学、曾在的电子科技大学

为例，我们对于校内人才的评价要求就是，每个人只统计一个含金量最高的“帽子”即可，待遇也只与这一个挂钩。现在，在有些年轻人的简历中，有时仅仅填称号就需要用一整页纸才能容纳下，但这么多的称号又有什么用？能证明些什么呢？只能说明这几年他们花了太多时间耗在了这些重复的事上。

对于今天的人才而言，他们已经不用担心温饱的问题，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和舞台。比起这些称号，他们更应该做的是摒弃过多杂念，静下心来搞十年以上的研究。应该说，现在优秀人才都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甚至在国外拿到学位，有着非常好的基础，这些人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他们不应该在一个门槛上反复去做无用功。当然，我们都有责任为他们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和潜心发展事业的氛围。

“在基础研究领域，出现了‘帽子’人才满天飞、原始创新乏力的尴尬局面。”在朱日祥看来，基础研究面临的众多问题中，人才评价体系是最亟待解决的。更让他着急的是，最近几年，这个问题反而因为“双一流”带来的高校人才抢夺战而愈演愈烈。他表示，为了评上“双一流”，高校都在抢夺“帽子人才”，挖

人的看重数量，被挖的看重待遇，这种乱象蔓延十分不利于基础研究的发展。

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长江学者、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正是被频繁提及的“帽子”。朱日祥提出，这些种类繁多的“帽子工程”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生态，加剧了学术界的浮躁学风，不利于青年人才心无旁骛地做研究。

朱日祥认为，为了营造长效机制，国家应尽快建立以科学贡献量为核心的人才考核。他说，基础研究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可能性，更要鼓励青年人才大胆探索创新。创新人才的培养不能靠大跃进，让优秀青年人才享受宽松的科研环境和探索过程才是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把帽子品牌转向创新品牌。

科技评价体系改革要减少“人才帽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近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周忠和说：“科技评价体系改革事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成败，在我看来，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被学术界诟病多年的科技评价体系。”

“中国的专利数量早就是世界第一，2016年中国论文数也排到了世界第一，然而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中国的科研实力现在就能与美国相提并论。我们最缺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重大原创性成果以

及成果的有效转化。”周忠和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对于《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的出台，周忠和说：“这些举措都非常及时，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向以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机制的转变，非一日之功。因此要从国家层面上加大统筹部署力度，希望政府把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当作科技体制改革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在国家有关政策的落实上下足功夫。”

鉴于当前存在的问题，周忠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要大幅减少、清理目前存在的由政府部门主导的评估、评比、奖励、‘人才帽子’工程等，过多的奖励客观上助长了学术界的浮躁；其次，学术评价应当真正回归科学共同体，政府部门做到不干预、少干预至关重要，增加学术评价的荣誉获得感，减少利益挂钩，与此同时要建立稳定合理的薪酬分配制度。”

“与此同时，还需加强科学共同体自身建设，要在全社会大力宣扬、加强学风和科研伦理道理教育，对学术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周忠和表示。

不唯“出身”论人才，“不是头衔说了算”

“做出影响世界成果的‘土鳖’（本土博士），得到的特别待遇是‘破格提拔

研究员’；而作为人才引进的‘海归’，也许什么都还没做，就已经当上了‘研究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在今年两会上讲到了这个值得反思的对比。

近年来，以“出身”论人才，已经成了不少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吸纳人才的“标准动作”。一些高校为“海归”博士开出高价码，不仅职称评定“一路开绿灯”，而且在科研资金、住房待遇等方面明显倾斜，甚至有些科研机构 and 高校用人非“海归”不要。

作为设计并指挥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土院士”，王建宇向媒体介绍，“墨子号”4个核心设备的负责人都是和他一样的“土八路”，其中3个是80后。近年来他亲历的一些重大成果，很多都来自本土培养的科学家。对于“海归”与“土鳖”的差别待遇，王建宇呼吁，引进人才当然重要，“但千万别忘了扎根本土的人才”。

两会上，与唯“出身”论人才现象同样受到代表批评的，还有人才评价的官本位现象。“怎样算干得好，怎样算干得不好，这不是头衔说了算的。”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首席科学家刘若鹏说，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其重要性在于，让大家团结起来，“面对重大事业目标时，能从国家层面到自身层面，大家利益一致，利出一孔”。

他认为，以事业和价值输出为导向，对科技创新人才的评价十分重要。

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人才培养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还有很多坡要爬、坎儿要过。

“我们应当承认，现在愿意当蓝领、立志扎根一线的人还不多。”全国人大代表、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总装配厂调检一车间“王涛班”班长王建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有对人才评价机制进行改革，通过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才能让更多的人立足岗位、精益求精”。

“别把对学术领域成就的评价简单等同于高考的模式。”刘若鹏说，目前大家呼声比较高的是改革基础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如果只按照论文数，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话，很难激发大家原创性的想法。要让评价和考核的指标更加合理，才能促进基础研究的原创性工作。

他认为，对于新兴的研发机构，特别是从事颠覆性创新工作的，不能靠一个简单的评价体系，“因为既有基础研究工作，还要奔向最终的价值输出，这有漫长的周期，需要战略分解”，因此要有整体的顶层设计，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产业化，需要完整的路径设计。

张水波认为，在人才评价机制中，更应引导“培养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急需

的人才”这一时代要求，“对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的人才，在评价上要予以倾斜”。

多年从事“一带一路”国际工程研究，他注意到，我国需要大量外向型、创新型、复合型，并在国际市场上“走出去”的人才，而这类人才，长期在国内外艰苦的环境下工作，背负家庭、文化

差异的巨大压力。对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的这类人才，应该在人才评价中得到体现，“这样才能达到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使人才这个稀缺资源真正发挥其增值作用。”

原文刊载于《科技网》

2018年3月13日

人才评价，如何摘“帽子”换“尺子”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指出，当前，我国人才评价机制存在分类评价不足、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手段趋同、评价社会化程度不高、用人主体自主权落实不够等突出问题，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在众多机构中，人才云集的高校可谓上述矛盾的集合体。事实上，建立科学的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分类评价体系，正是眼下大学校长、教授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在今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对此反响热烈。

做好人才的分类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现行的高校人才评价机制中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考核指标过于量化，过度关注论文与科研项目数量。实际上，评价机制的关键在于对人才的发展规律如何正确认

识与理解，人才评价是一门管理科学，无法像数学建模般精确，很多情况下要用经验甚至主观判断来弥补不足。

我认为，首先要做好人才的分类工作。科学研究有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的创新两种形式，对不同形式人才的评价要有所区别。我们鼓励教师在科研上自主探索，但往往短期论文压力会迫使教师放弃自己的长远目标。基于此，华中科技大学组建了100个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创新团队，每个团队由2~3人组成，评估确认后给予资助，团队可不报项目，每年汇报已完成工作来进行评估，目前已有29个团队入选。第二种科研形式有组织的创新，是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项目深入研究。针对这种情况，华中科技大学制订了“登峰计划”组织团队协作进行科研，评估时对整体团队考核，不评估其中个人。

高校要为教师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教师能根据本心，无后顾之忧地进行科

研教学工作。过去经常有教师考虑成果产出问题，如液态研究更容易，固态研究难度高却更有意义，一些教师就会在研究液态或固态之间举棋不定。鉴于类似问题，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引力中心则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考虑到国家安全，引力中心的实验成果即便是取得了重大性突破，也只能在“山洞”里暗自庆祝。而由于中心的很多实验组常年不能发表论文，这就极易造成在学校年度考核不合格。为了消除科研人员的顾虑，引力中心提出以实验室为单位进行考核来取代个人考核，这就使得有重要科研任务的教师们无惧年度考核压力，能够专心科研；此外，由于国外的技术封锁，使得我国研究人员只能通过反复试错走向正确，对外而言，中心的研究成果都已经是国外发表过的，因此常年没有所谓新研究成果也让不少人产生了误解。不过，也正是这些“重复”国外技术的人，使得我国逐渐开始在相关领域占有主动。

而高校分类评价政策的跟进，实际上是要鼓励教师根据自身兴趣与情怀进行科研。我们也不用担心，将选择权交给教师后，出现都选择面向未来某一方向的科研，而忽略了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趋向。不同高校、不同学科各有特点，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

全面激发高校教师积极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近几年，大家常常讨论高校教师的绩效考核和评价体系问题，形成了一个共识：高等学校若继续单纯以发表SCI论文作为主要评价指标，既不利于发挥教师倾心教学、创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引导教师“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必将影响高校教师通过关键技术研发和实际应用转化，服务国家发展的创新性。其中，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影响更为明显。最近，国家发布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无疑对于改革和完善高校教师评价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高校必须对学校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的教师进行分类考核，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从而充分调动全体教师热爱教育教学、潜心创新研究、主动服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性。对于大学而言，首先必须要求教师将教学视为“天命”，积极从事本科和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实验和社会实践教学，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优质教育，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境界和格局，指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个扣子”；学校要鼓励教师紧盯国际科学前沿、坐得冷板凳、敢碰大科学问题；学校还要充分发挥自身学科特色，结合国家和区域发展特点，鼓励教师面向国家战略，解决关键技术、产业升级、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

就要求学校不能单纯地以论文发表这一指标来评价教师业绩，尽快制定符合学校发展需要、适应学科发展规律、适合各类人才成长的分类管理和评价体系，真正落实“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的管理和服务理念，让每个人的劳动和贡献得到认可，尊重教师，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当然，在推进教师分类考核和评价体系建设过程中，高校要不断完善内部管理机制，提高服务师生的能力，为教师创造干事、创业的平台和条件，营造先进的大学文化。还要在发展中不断优化评价指标，适时提高考核“门槛”，鼓励和引导教师结合自身积累和优势，术业专攻、建功立业。

目前，兰州大学已经制定了不同学科门类的教师分类考核方案，各学院也在完善和优化教师业绩评价指标，并将在试行中动态调整，优化评价和绩效考核体系。同时，结合学校实施的“云上兰大”计划，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和职能部门服务能力，尽可能减少各类统计和考核对教师的工作负担，使他们更安心和专心于各自喜爱和擅长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

别用篮球规则裁判铅球运动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对于人才分类评价机制的问题，此前政府一直在倡导，国家也将其看作是建设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当前，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正在不断完善之中，但的确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目前高校中比较看重的“杰青”“长江学者”，这些评价当然很重要，但這些“头衔”大多是从基础研究视角考量的，侧重评价研究者在科学研究上的业绩和贡献，对于某些以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作为优势的学校来讲，他们的科研人员有些在解决国家重大需要和行业重大技术创新或解决关键技术瓶颈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就因为没有针对他们的适当的评价体系，这对于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人员来讲是不公平的。同样的问题也经常出现在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人群中。人才分类评价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是个好消息。

我们应当看到，在现阶段，人才分类评价机制的落实还存在许多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一个关键点在于基层单位落实政策要与自身定位、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外界对大学（研究机构）整体的评价取向相契合。

具体而言，目前外界有很多由商业机构主导的针对大学的排行榜，这些排行榜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在其背后，都有一个重要参考因素——高被引论文。如果高校自身对于教师的评价导向改变了，而社会评价机构对于高校的评价标准不能分类评价，单纯从知识或学术创新角度考虑，忽视在技术创新上表现卓

越的这部分大学，就会导致评价导向上的偏差和缺失。

换句话说，当高校对人才评价机制发生转变时，社会对于高校的评价却没有进行相应改变，这就会导致两种评价导向不能够相适应，从而对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在高校中的落实产生阻碍。因此，对高校整体评价机制的配套转变是政策落实很关键的一点。在此，我强烈呼吁，要从体系上整体落实分类评价的导向，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此外，在中外高校的对比方面，中国高校与国外高校也存在一些差别。比如，我国大学需要承担大量为“两个百年”梦想建设的任务，比如工科类的院校要为行业解决重大创新、行业转型升级等关键技术创新问题，这一点与国外高校不完全相同。

因此，我们不能一边提倡人才分类评价，另一边又按照单一标准对高校进行评价，这样不同的两个价值的并行，就会形成发力方向的夹角，使得政策落实的合力减小。在我看来，国外的排行评价体系并非不合理，只是排行的影响需要缩小，国外很多名校也并不是完全看重排行的。评价体系中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对于基础研究还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大学千差万别的性质，导致并不是所有高校要用同一种评价指标和体系。就好比我们不能用篮球运动的规则，去衡量铅球运动一样，把它们放在同一个

赛制上是不合理的。

人才评价机制须系统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最近，我国高教界有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紧接着就颁布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其实，这两个文件所谈的问题是共性的，也是中国科技界、教育界呼吁很多年的问题。

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之所以会如此困难，我认为这并不奇怪。

首先，这么多年来，人才评价机制是以行政为主导的，其结果就是往往并非同行评价同行，而是评价体系标准单一，比如“唯论文”，以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来评价，一把尺子量到底，显然是不合理的。这当然是最简单的方式，也最能体现行政化的特点。所以我认为，没有针对不同类别的人才，建立起真正的同行评价机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资源调配中，中国一直都是从上到下的，自然也就必须通过一些自上到下的人才评价机制的方式和方法，这也导致了行政和资源纠缠在一起。而且，当前社会的高速发展对科技界、教育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部分从业人员存在比较浮躁的心态，凡事追求见效

快，希望短时间内在社会上、业内以及领导那里达到一定的认可度。

此外，人才本身是有很多类别的，比如教学、科研、应用开发和管理等，多样且复杂，即使是同一个专业，也分为搞基础的、搞应用的、搞实践的等。所以，要建立同行评价机制，而它的建立则必须赋予使用人才的部门一定的自主评价权。

实行人才分类评价机制，自然可以调动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使其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这种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但总的来说，要想真正建立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并非一两个文件就可以达到的，需要人事、学术、资源调配等多方面的配合，也需要一系列的综合改革。

在国家层面，要制定一些宏观指导政策，规范各种人才计划的评审。现在的国家级评审基本是大同行评价，各种行业、各种专业的人都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竞争，首先就导致评价不科学。所以，国家首先要对多年来主导我国人才评价的各种评审做一些规范，实行分类指导。

其次，还要简政放权，把人才的培养、评价与各个单位的实际需要结合在一起。国家在宏观上可以做一些管理，比如学科、编制、政策调控等，但在具体实施细节上，要真正把人才评价落实到单位，单位落实到同行。

地方院校须形成精准的师资队伍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

东：分类首先涉及一个粗细问题，太粗，起不到精准的作用；太细，势必把学校碎片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一个事实是，地方院校的分类指导比中央直属大学的分类指导要更复杂、更精准。首先，地方院校不能单纯地分为教学型或研究型。其次，地方院校承担着更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工作，拥有一支创业型或企业型的师资队伍。因此，在教学型、研究型之外，要分出应用型或企业型这一类别。此外，分类还可以按学科细分，其中工科又可以分为传统工科和新工科，文科又可分为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还有新型交叉学科。不同学科的情况不同。理科教师认为要以论文为主导，工科教师希望看服务社会的业绩。

对于苏大而言，还有民用与军用之分。军用不能发文章也不能申请专利，具有保密性质，甚至不能报道，考核评价还有严重滞后性，不能当时考核教师，项目做完与否、做到什么程度也不能由学术委员会评价。

师资队伍的管理与基础相关，一般来说，中央直属大学、非地方院校办学周期较长，大学内部治理比较完善，师资队伍对大学内部治理有着自我修复和管理功能。而不少地方大学自我修复和管理相对于中央直属大学、非地方院校更缺乏经验，这就意味着在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评价里，地方院校必须

更精准、更直接、更易操作。这就涉及如何分类、分类的基本原则两个问题。理想形态是分类细致、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发挥作用，但是根据苏大的实践结果来看，分类宜先粗后细、先广后窄。最大问题在于分类体系过于复杂，无法相互比较、借鉴，由原来的大一统变成了五花八门、乱糟糟，由“统一的仓库”变成了“杂货店”，这是要避免的。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既要强调学科特点，又要面向未来，切忌把学科的弱势变为特点。工科教师告诉我不能拿论文作评价，却说不出应拿什么来做评价；医学教师认为评价要尊重医学规律，却说不清究竟是何规律。能否使评价标准、学科规律可操作、可实现、可具象到条例上，有时候的确很困难，但即便困难也得推进。目前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形成精准的师资队伍，要么大一统，要么自由主义，二者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关键在于实施的制度设计

全国人大代表、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尧德中：《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在于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对应的评价。

我觉得，落实的关键在于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如何让指导意见的精髓原汁原味地落到实处。如果没有好的实施细则，实际效果有可能走向反面，比如

“定性评价、同行评价和社会评价”，可以说是国际上通行的好办法，因为人才领域、成就的分散性，单一的定量评价是很难做到公正、公平的，然而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加之诚信制度、惩戒制度的欠缺，这一规定就有可能导致反面的效果，助长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要想将其落到实处，根本在于实施的制度设计。在这方面，我认为可以借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人才项目评审，它应该目前国内公正性认可最高的项目，原因就是它有比较好的匿名通讯评审，核心在于建有较好的专家库，并要有较好的监管机制。此外，借助一些较大的专业学会也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在专业学会，基本能够实现真正的同行评审。

分类评价的优势或者说核心就是分类，分好类是成功的第一步，分类就是对客观差异的认可。我想补充说的是，在指导意见中“不同职业、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背后，还应该考虑地域的差异。

“人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落后地区，一个初中生或高中生，如果能解决当地很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就是当地的人才；在北京、上海，一个海归博士可能都算不上什么人才。从全球范围看，我们自己认为的许多“优秀”人才，可能也难被全球同行认可。应该说，在一个地理范围内的一定比例

的人就是相应的人才。因此，人才一定是有限定语的，评价也是带有限定性的，在哪里评、由哪些人评，他就是哪个地方、哪个圈子的人才。

为促进国家均衡发展、鼓励人才的合理流动，国家级人才的评定应该考虑区域性的分布。

要想真正建立和实行好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关键还是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许多考评与“帽子”人才数量挂钩，导致许多单位不分青红皂白的拼凑人才数量政绩，严重扰乱了人才“市场”，破坏了人才成长环境。在这方面，国家需要制定一些引导性的规范。

人才分类评价可试点先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王训练：对人才分类评价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

在现行的人才评价机制中，通常把论文数量和论文的影响因子作为主要标准。这一标准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与特色，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但它具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并不能适用于衡量全部人才。比如在高校从事数学、外语等基础课的教师，如果能够将自己的学生培养成高质量的人才，他就应该得到与其贡献相适应的尊重和评价。现在很多学校一评价人才就要“数论文”，导致很多原本更专注教学的教师不得不抽出

更多的精力“应付”论文，这就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学校、教师的职责究竟是什么。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高校最本职的功能是培养人才，“你给我一个孩子，我还你一个人才”。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是高校和教师真正的职责所在。人才分类评价体制的出现，使得各类人才都能够得到认可和公正的评价。

然而，如此好的人才评价机制虽然早已提出，却迟迟未能真正落实，其中最大的影响、限制因素就在于现行的高校评价体系，并不能适应人才分类评价体系的要求，不能在人才分类评价落实上形成合力。社会诸多的评价标准、排行榜，导致高校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挖人才、建重点实验室，将顶尖人才剥离出了基础教学，这是很可怕的现象，也是对于优秀人才资源的浪费。这样的社会评价与导向对于人才分类评价并无助力。

那么，人才分类评价机制究竟该何去何从，该如何落实这一机制？我认为，人才分类评价制度的落实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一步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迈出的。考虑到我国高校内部组成人员与学科的复杂性，我建议可以选取一些院校作为试点，率先开展人才分类评价工作，以此做一些先行探索。比如学校可以将基础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剥离出来，对不同学科的教师以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教

师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高校教书育人的要务。

实行高校教师兼职分类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朱晓进：“高校教师兼职虽有利于实现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提高教师社会责任感及收入，但兼职活动需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势必会对教学、科研等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朱晓进建议，应对教师兼职活动进行适当分类管理，在责任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防止本末倒置现象出现。

朱晓进说，依据可能导致的利益冲突、责任冲突严重程度不同，对教师兼职活动可分为禁止型兼职活动、限制型兼职活动和鼓励型兼职活动。同时，在高校人事部门成立专门的教师兼职活动管理机构，负责教师校外兼职活动的信息搜集、整理和统计，并加强对有校外兼职活动的教师本职工作的考核，尽量减少兼职活动对其校内本职工作的不利影响，保证教学和科研质量。

建议深化改革“杰青”“长江学者”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由于对高层次人才的管理不到位，造成了人才的无序流动，同时还挫伤了许多科学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建议，深化改革“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项目”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

杨善林表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等目标而设立的人才基金项目，有明确的资助周期和项目管理办法。但在实践中，项目承担人被固化成为一种身份，被一些权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学科设置和学科评估等各类评估中反复应用，从而使得一些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不惜代价，以高额工资为诱饵引诱具有“国家杰青”头衔的青年学者离开原工作单位。

“这既不利于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具有‘头衔’的青年人才的自身成长。”杨善林建议，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应该回归项目属性，当项目结题后，在各类评价中不应将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以“国家杰青”的头衔反复使用。

杨善林同时还建议，教育部组织评选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含讲座教授和青年学者，应该回归岗位属性。“当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离开原有岗位时，原来的岗位需求不复存在，单位和学科的基本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应该立即终止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资格。”杨善林说。

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制定引导高层次人才潜心工作和有序流动的政策，例如连续资助、延长聘期等，鼓励

高层次人才向“优、需、特、新”的方向流动，鼓励他们在这些岗位上深入开展长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攻关工作，争取获得原创性研究成果，为科学教育事

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建设作出实质性贡献。

原文刊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8年3月15日

创新中国如何激活人才“富矿”

中国正从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向真正的人才第一强国迈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人才资源，这是创新发展的最大“富矿”。

如何用好这座全球最大的人才“富矿”，成为摆在创新中国面前的一道课题，也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人才是第一资源。”3月7日，习近平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说，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要靠人才。

今年两会前夕，《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炉，这一改革被列入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

“如果说以往教育领域的单项改革是一首钢琴独奏曲，那么人才的综合改革就如同一曲交响乐，而人才的评价机制就好比乐队的指挥棒。”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打了个形象的比方。

在他眼中，这根“指挥棒”作为一

种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无疑具有极大的导向作用，能带来人才“涌现效应”，“人是改革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的评价归根到底，还是要激发人的动力、活力和潜力。”

“一把尺子量到底”造成人才评价单一化、短视化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人才评价机制存在分类评价不足、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手段趋同、评价社会化程度不高、用人主体自主权落实不够等问题。其中，人才评价单一化、简单化，是人才评价机制最受诟病之处。

李家俊代表认为，这一问题反映在我国高校教师的实际评价过程中，就是仍以定量的终结性评价为主，而忽视教师的教学手段、对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以及需要长期追求的原创性科研成果等难以量化的定性评价。

同时，还存在评价“短视化”的现象。目前，教师评价体系过于注重近期数量业绩，忽视长远质量积累，造成学术界表面上的繁荣，却不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和原创性科学研究的开展，

影响教师自身潜能和创新能力的发挥。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授张水波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一些高校存在“唯科研项目论”“唯论文数量论”，“这种人才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导致高校教师变成‘论文制造器’，”科研好的教师可以一切“通吃”，如评职称、提升行政职务、获得社会荣誉等。

李家俊认为，“单一”指挥棒的方向，直接导致教师队伍出现三种负面倾向：重业务轻思政、重数量轻质量、重业绩轻发展。在传统奖惩性评价理念下，将教师评价当作一种具有选拔、甄别功能的管理手段，缺乏对不同类别教师的职业目标及职业发展的关注，“对人才发展潜力评价不足，这样不利于调动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更不利于促进各类教师的职业发展。”李家俊说。

“干什么、评什么”要分类、差别化

对人才的科学评价首先体现在评价标准上，而现有的评价机制对一线创新创业人才正向激励不足，甚至引发弄虚作假、学术腐败等突出问题。为科学客观公正评价人才，《意见》按照“干什么、评什么”的原则进行改革，实行分类评价，突出品德评价和注重凭能力、业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其目的就在于，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等倾向，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对不同人才实行差别化评价。

对此，一些地方已开始行动。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光向媒体透露，今年天津市将深化职称制度改革，重点在完善体系、优化指标、下放权限、扩展范围等方面抓好改革落实，使职称评价方式更科学。

对于高校人才评价机制的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李家俊代表认为，应从多方面着眼。首先是强化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评价体系，将师德和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教师评价体系的硬性指标，引导教师成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设计者、反思者和实践者。

同时，建立科学的教师分类评价体系，推进分类管理。他认为，教师评价应根据不同学科特点、不同岗位职责、不同发展阶段构建教师分类评价标准体系，“评价的内容、重点和方式要体现出差异性”。

更重要的是，以评价为导向，促进教师的职业发展。把教师评价的结果作为薪酬体系和职业发展体系设计的依据，“通过评价，使个人利益和组织发展有机结合，实现高校和个人的共同进步。”李家俊说。

张水波委员则建议，人才评价指标要根据其工作体现的“最终价值”而不是“中间表象”来确定。这需要设计一套复杂的评价系统，根据其工作任务和性质来评价，比如基础科学研究看成果

的国际影响力，应用研究可以看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价值。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

2018年3月12日

高校非理性人才竞争如何遏止

人才资源是高校发展的核心资源，高校之间的竞争，关键是人才资源的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本属正常现象，有利于促进社会智力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而当其走向非理性状态时，危害可想而知。该怎么避免？这个话题成为今年两会上的热点，关注高校领域的代表、委员们，对此谈论颇多。

对人才考核要看成果的增量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原厅长罗伟其：“目前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人才非理性竞争的现象，原因出在指标体系设计不够完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原厅长罗伟其说。比如一个高校的学科评价，达不到一定的人才指标，重点学科就过不了，申报项目也不行。这就会导致为了学科建设等指标，高校首先想到去挖那些已经有成果的人，“挖过来合着材料一包装，急功近利地达成目的”。

罗伟其指出，高校之间挖人挖的只是存量，导致的结果就是科研人员和学术氛围的浮躁，对学科的长远发展不利。

为此，罗伟其建议，由中组部牵头，教育部、发改委、科技部、人社部等积

极配合，对人才考核指标进行修改。比如从A单位流动到B单位的人员，参与申报项目的成果只能从进入B单位之日算起，“要更加注重成果的增量，这就可以杜绝非理性竞争”。

罗伟其说，高层次人才要注意长期积累，队伍建设要杜绝急功近利。他指出，通过合理规划，把一些需要帮助的年轻人真正“用起来”，人才队伍建设才能上一个新台阶。

人才竞争的目光应该向外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我被人挖过，也挖过人。”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坦言，他们学校有位微生物方面的学者，被上海某所高校挖走了，不到两年就当选为院士。痛失爱将，邓秀新的惋惜可想而知。“深受其害，但是裹挟其中。”邓秀新说，“我们在挖人，尤其是西部高校人才时，总会征求一下对方学校的意见，尽可能地选择人才两边利用、两边带学生的办法。如果对方高校没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可以挂靠我们学校，联合招生，作为弥补和帮助。”

邓秀新之所以狠不下心，是因为亲耳听过很多西部高校的“辛酸史”。据他

透露,西安某所地处偏僻的高校,在 2000 年之前,其农业经济管理学院是很牛的,但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先后被挖走了 90 多人。

“人才流动是正常的,国家无法干预,反正到哪里做贡献都是好的。大家竞争人才的眼光应该向外,有本事你去吸引国外的牛学者。”邓秀新说,经过一轮“985”“211”建设,东部与中西部高校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家应该在分配资源时多向西部倾斜,多点雪中送炭。

“要警惕这种非理性竞争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邓秀新是研究果树学的博士、国家柑橘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他有一个发现,在农业扶贫过程中,想在西部找一位对农业经济作物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很难。东部研究者无法关注到中西部的经济作物,而西部研究者想做研究没有经费,这是长期以来西部人才流失、资源缺乏的叠加效应。

规范高层次人才待遇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要通过机制体制创新,形成开放竞争的用人机制,让高校之间人才的竞争回归到对人才智慧和能力的尊重。”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说。

熊思东认为,通过开放竞争的用人机制合理提高人才待遇,对于营造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环境,激发人才的成

长动力具有重要作用。人才非理性竞争,除了与部分高层次人才定力不足有关外,也与高校间过于看重财力有很大关系。

因此,他建议,规范高层次人才待遇标准,限制引才“价格”上限。国家相关部委及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应组织高校广泛开展座谈调研,共同研究出台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人才最高待遇标准;同时,引导高校正确处理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的关系,缩小引进人才与本土同类人才待遇差距,设置同一高校内,同学科类型、同层次人才待遇差距上限。

熊思东还建议,加快人才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和人事仲裁机构建设。所谓高校人才市场诚信体系,是指以电子诚信档案的形式记载和披露高校人才以及高校组织在人才市场的相关活动,并将此电子诚信档案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市场进行人才交换的参考。同时,建立高等教育人事仲裁机构,对于学校间滥挖墙角、人才不辞而别等无序现象采取有效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保护高校人才和高校组织双方的合法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临时党委书记张政文:“我建议,高校之间签署自律公约,在人才流动问题上达成共识,通过自治的方式携手解决人才无序流动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人才流动,怎样是合理的,怎

样又不合理，目前没有清晰的界定，高校自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统筹力度，引导人才市场良性健康发展。”接过了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志远：“我对高校挖人现象深有感触。”“目前‘挖人’主要是拼待遇，一个比一个开价高。而在德国，教授分为三个等级，相同等级的教授无论身处德国中部、南部还是北部，都是相同的待遇。”朱志远认为，解决的办法在于国家出台薪酬标准的指导意见，划定一个明确的上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据我观察，从我们学校跳槽出去的几位长江学者、杰青并没有比一直留在学校的教授发展得好。”大学应该处理好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的关系，不要一味地搞拿来主义，忽视了本校“苗子”的挖掘和培养。谈到如何遏制不正当的“挖人”之风，姜耀东的想法与朱志远不谋而合：“尽快建立不同层次师资队伍的国家薪酬体系。”

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报》

2018年3月15日

提升工程师培养质量

工科学生实践教学严重不足，缺乏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缺乏对工业流程的了解。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表示，针对当前工程教育存在的实际问题，亟待优化高校工科教师结构、加强校企合作，有效提升工程师培养质量，更好适应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

“《面向创新型国家的工程教育改革研究》课题组对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校教师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90%的受调查者认为，影响工程教育质量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具有工程实践背景的师资队伍。”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院士指出，我国工科教师队伍“非工化”

趋向日益增加，工程设计和实践教育严重缺失，这一状况亟待加以扭转。

钱锋建议，政府要完善政策，明确工科教师入职条件；特别要改革工科教师考核评价体系，高校在职称晋升与考核评价体系中，应该实行理工分类评价，对于工科教师不可单纯以论文论高低，更要关注工科教师的科技创新、专利成果在技术转化中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因素。

此外，一些代表委员指出，目前校企合作从理论上讲是双赢，但存在很多实际困难，诸如师生工程实践的精力和时间、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企业的回报等问题，因而，校企合作名不副实现象较为普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

影响了工程师的培养质量。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厂维修部门党支部书记徐小平表示：“虽然都叫工程师，但是我们感觉和车间一线脱颖而出的工程技术人员相比，大学工科毕业生往往空有理论不接地气，做出的项目计划有时不那么管用。”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李斌表示：“工科大学生培养往往是从课堂到办公室，浮在表面，学生缺乏充分的动手和体验。”

钱锋、徐小平、李斌等代表委员建议，通过减税等鼓励政策推动企业向高校师生开放工程实践与实训，促使企业更好树立社会责任意识。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机制，制定有利于企业高层次科技管理人才到高校任职的政策与制度，也为到企业培训和实践的教师提供相应的保障与支持。

原文刊载于《新华网》

2018年3月14日

【社会服务】

高校如何为国家战略服务

“在学校管理发展中，我发现有些高校教师注重埋头科研而忽略对国家发展大趋势的掌握；学校人才培养滞后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高校对接政府、行业企业机制不畅等现象并不鲜见。”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大学副校长郑军近年来一直在思考“高校应该如何为国家战略服务”这个老问题。

回应社会需求、服务国家战略是教育应有之义。高校如何主动利用其人才、资源、信息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以各种方式和途径为国家战略服务？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

聚焦高精尖，服务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在郑军看来，高校服务国家战略也要分层次。“研究型大学要培养心怀天下的创新人才，要为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依据，要成为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要架起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文明成果交流的桥梁。而应用型大学要培养具有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的潜在劳动者，要进行校企合作、行业协作，主动对接企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工作，实现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要为所在地区提供优质的文化和智力服务。”郑军说。

在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委员看来，高水平大学培养的人才更有可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双一流”大学责无旁贷。据罗卫东介绍，当前浙江大学以国家实验室为目标，探索建设浙江实验室，与阿里巴巴达摩院和杭州市合作，推动高精尖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等。

“杭州要成为国际性城市，建设科学研究的国际中心，离不开高校的支撑。”罗卫东说，当前杭州在生物科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已处于世界前列，瞄准“国际科学研究中心”吸引全球科学家聚焦，还需要政府在资源调配和规划上对高校有更大的扶持力度。

“比起直接进行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国家对高校的支持更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魏世忠委员认为，高校不仅培养人才而且为当地输送人才，引领技术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据魏世忠介绍，河南科技大学在过去5年获得了6项国家科学技术奖，都是与当地企业合作研发，获奖的项目也广泛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于矿山开发、余热发电、交通建设等。

聚焦中西部崛起，服务地方跨越式发展

中西部地区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洼地：地理位置偏，经济欠发达，科技

人才缺乏，创新创业环境有待改善……中西部崛起，尤其需要教育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2013年从清华大学来到青海大学时，我想实在不行就把自己的学术先放放，把学校带好。没想到来了之后，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反而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学术平台。”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委员感慨地说。

青藏高原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有充沛的水资源，有独特的高原生态，有盐湖，有锂电池……王光谦上任后，打量着这些内地所没有的资源，这是国家大力支持的战略项目，也是青藏高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怎么带领青海大学发展、利用好这些资源为国家战略服务？王光谦主动引进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团队，建立了青海大学太阳能新能源光伏中心，进行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由他牵头的清华土木水利学院团队和青海大学团队合作的“天河工程”已经为青海省干旱地区实现了多次降水。

“找准结合点，教育服务中西部地区也有大舞台。”王光谦说。

郑军看来，地方高校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呼应国家发展需求。“长江大学位于湖北，取长江之名，作为地方综合性高校，在转型发展中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题中应有之义。”郑军说。

怎么服务？“‘长江经济带’覆盖长

江沿线11个省份，全长6000多公里，其发展涉及土地、气候、环境、资源等方面。长江大学充分发挥了农学、资源等学科优势，成立了长江经济发展研究院，对‘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文化、土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研究。”郑军说。

郑军认为，服务国家战略对高校和地方来说是双赢。“一方面充分发挥高校的学科优势，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在学科研究的方向上直接服务行业企业和地方发展；另一方面，高校也更加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在服务地方的同时提升科研水平、教师素质，检验人才培养质量。”郑军说。

聚焦人才培养，服务“一带一路”新需求

“我调研的20多家企业都说缺人。”2017年暑假，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主任张水波委员，用半个月走访了20多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央企。“他们业务范围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而每个企业都反映最缺的就是人才。”张水波为高端人才短缺现状深感担忧。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高端人才尤其是制造业人才、金融人才、工程人才等都是紧缺的。

“从目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来看，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尤其缺乏外向型、复合型、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张水波说，高等教育要在“一带一路”

人才培养上下功夫。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指出，云南应该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要着力推进五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形成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设施体系。作为“一带一路”南线桥头堡的云南，辐射东南亚、南亚、西亚等20亿人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经济往来、科技往来，首先需要的是人才，服务‘一带一路’教育是先行者。”昆明理工大学教授罗黎辉委员说。

罗黎辉介绍，云南一直坚持高等教育“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一方面，办好“国门大学”，加强与周边地

区、毗邻地区的教育科研合作，输送留学生到周边国家求学；另一方面，加大招收周边国家留学生力度，为“一带一路”培养人才。

“服务‘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必须‘两个轮子’一起转。一个轮子是瞄准‘双一流’建设，建好‘国门大学’，开展科研合作和学生交流，另一个轮子应该考虑区域‘双一流’，通过区域一流辐射周边、服务周边。”在罗黎辉看来，“两个轮子”一起转，高等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才更有力。

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报》

2018年3月14日

科技成果转化 需要平台队伍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 王焰新

高校是科技成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推动教育与科技、教育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看，我国高校科技成果丰硕，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已超过17%，但相比美国的高水平大学，如斯坦福大学45%左右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尚有差距。

在我看来，制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结合有待进一步强化；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专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队伍和平台建设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鼓励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支持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融通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落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这为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径。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在推进国家顶层设计落实、提高科技创

新供给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亟须建设市场化、专业化的转化平台与队伍。

首先，要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型创业融通发展。支持高校面向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前沿技术需求，加强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以改革科研项目管理体制为突破口，推动高校科技创新由自由探索为主的供给导向型向市场需求导向型转变。

其次，要建设一批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重点支持“国家知识产权运营高校科技创新试点平台”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通过专业化的管理和运营机构，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营共建、共享、共创。

培育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队伍是关键。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健全对科技创新人才和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的激励措施。鼓励各高校加强知识产权、技术转移、产业孵化相关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最后，要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营工作。持续优化政策环境，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探索科技银行建设、发展多层次科技资本市场，推进政策链、资金链、产业链环环相扣、相互支撑，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原文刊载于《人民网》

2018年3月19日

打通科研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全国人大代表 杨雪梅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全国人大代表、黄河科技学院院长杨雪梅所关注的。

科技成果转化 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

长年工作于教育领域的杨雪梅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

“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杨雪梅说，但是，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相对偏低，科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杨雪梅认为，是因为目前我国科技评价还是重理论、轻应用。“目前科研评价体系基本上以论文为导向，并且大多数项目和奖励

也主要以论文为基础。这使高校也以同样的方式考核相关院系与教师，无论是决定晋升还是评绩效，都会把专利数、论文数等作为重要参考指标。”所以，这种科研评价实行“一刀切”的现状，导致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为了评职称而做研究”。

杨雪梅认为，我国还存在科技成果转化少、渠道少的现状。她说：“数据显示，高校每年平均完成的科研成果有3万项，但仅有20%可进行转化并批量生产，形成产业规模的则仅有5%，转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也就是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使得高校和企业之间缺乏沟通渠道，想从事应用研究、有应用研究成果的教师，不知道如何去找合适的企业；企业希望解决技术难题、寻求合适的技术项目，不知道如何找到合适的教师。

对于企业来说，杨雪梅认为，存在研发投入少、力量弱的现状。她举出几个数字：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学研究经费支出296.5亿元，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2.7%，这一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同时，企业还存在科研人才少、队伍建设薄弱的现状。

推进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怎样才能解决好科研成果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扭转科研和经济“两张皮”局面，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杨雪梅提出，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推进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细化和落实相关政策。

杨雪梅建议，相关部门改革科技评价体系，鼓励应用研究。“可以采取分类评价的方式，对于大多数普通院校，主要应当评价它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即使是重点院校，大部分教师的研究工作也应当以应用研究为主。”

杨雪梅还提出，希望企业可以增加研发投入，增强研发能力。

“我还建议可以加快培育企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企业不仅需要高端人才，更需要建立研发队伍。建议各级政府推广深圳、厦门等城市的政策，通过收入补贴等方式鼓励各级学历的毕业生到企业工作。”杨雪梅提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建议教育部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技术人员到高校开展研发工作，在职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培养壮大企业研发队伍。

原文刊载于《人民网》

2018年3月12日

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瓶颈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我之前有专利论文十几项，但最后没有一项转化成产品。”3月14日，武汉锐科光纤激光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闫大鹏代表对自己科研成果“零转化”的往事深有感触，“搞科研的不一定会做买卖，做买卖的不懂科研。科研对接市场，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然而，这其中有多少专利创造出了经济效益？据了解，在知识产权领域，专利权维持有效的时间，代表了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价格。2017年，在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中，维持时间10年以上的仅有4.6%，而国外维持时间10年以上的有22.8%。一边是专利拥有量逐年增加，另一边是大量科技成果难以转化——科研“只开花，不结果”。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支持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融通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科技成果转化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面对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可应用科技成果率不高、企业和个人参与科研项目不积极等问题，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建言，要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瓶颈，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王小川：按科技成果效益减免科研人员个税

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 CEO 王小

川建议，应创新采取应用类科研项目事后税收优惠方式，遴选出具有科研和转化能力的企业深入参与科研项目。通过减免个税等方式，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

王小川表示：“有些没有科研能力的企业，用低质量的、重复性的技术内容多年反复套取国家科研项目经费。一些单位甚至挪用科研经费发放工资奖金，列支人员或办公经费、考察费、交通费等，或者科研经费不按进度支出，在结题时突击花钱。这类单位虽然单项目金额不高，但累积数目庞大，占据消耗了一大部分国家科研投入，致使科研经费浪费。”

为遴选出具有科研和转化能力的企业深入参与科研项目，将科研资金向真正具有科研和转化实力的企业倾斜，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王小川建议，应完善科技激励机制，以科技成果转化产生效益为导向，创新采取事后税收优惠方式，将大企业应用类科研项目的事前资金补助，转变为事后依成果转化产生效益适当减免企业和个人税收，从而激发企业和个人科研热情，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为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强调以科技转化为目标开展科研，王小川建议，以部分新增应用类科研项目为试点，依据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效益

评判，对项目核心科研人员因项目获得的各级政府部门的科技奖金免税，自项目产生收入年度起3年至5年内予以日常工资、奖金的个人所得税减少50%等，以体现对科研人员的支持和重视。

程静：打造国家高精尖产业研究平台

“中国众多顶级高校院所研发的相当数量的成果，依然作为高校院所的成果‘库存’，不能有效发挥价值。”全国政协委员、中关村智造大街 CEO 程静表示。

她建议，要整合优势创新资源，打造国家高精尖产业研究平台。平台主要面向科研院所科技项目，提供物理空间、专业技术服务、市场需求对接资源服务、转化基金扶持等，实现“共享技术实验平台+快制中试平台+检验检测+知识产权+政策服务+人才服务+法律服务+财税服务+市场应用”等全要素精准加速转化平台，帮助科学家技术快速完成向成功应用技术市场的转型。同时形成一个以政府为指导支持的第三方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服务平台。

“通过市场化需求分析直接对接大型企业技术短板，同时接通各创新技术团队及科研院所的研究通道，从而解决技术成果转化的盲目性，做到有的放矢。”

“北京以人均专利数量 94.5 件，位列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排名之

首。”程静表示，鉴于北京丰厚的技术资源、众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建议率先支持北京设立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及科技母基金，联动辐射上海、深圳、雄安等科技创新资源高度聚集的地区，将平台落地在协同创新研究院。

易建强：取消科技成果转化第三方评估要求

“目前事业单位在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时，需要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拟转化的科技成果进行国有资产价格评估，这成了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绊脚石。”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综合信息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易建强表示。

易建强认为，科技成果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其价值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往往缺乏可供参考的定价标准，而只是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更无法用已有的商品定价模式为其估价。“科技成果只是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往往难有准确的估值。”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强委员表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往往缺乏可供参考的定价标准，这也给科技成果转化带来了风险。不少成果持有人因为无法承担定价风险，往往采取了最保守的动作，“宁愿不转化，也不能便宜卖掉”。

易建强委员告诉记者，评估管理规定有弊端也会影响科技成果转化进程。

据了解，现在科技成果转化必须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来评估。“科技成果的转让价或者入股价应该由该科技成果的持有方和受让方共同决定，而不应该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决定。”易建强说，此外现行的评估环节流于形式，缺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效果。有的评估过程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除了要向评估方支付不菲的费用外，还需提供各种评估材料。严重影响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时效性，给广大科技人员增添了巨大负担。

易建强建议，应取消技术转让和技术作价入股时必须将科技成果进行第三方评估的要求。科技成果的价格应当由持有方和受让方自行协商决定。此外，在技术转让和技术作价入股的协议模板中增加单位免责条款，从而强化科技成果持有人的法律责任，同时提高事业单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企业出题目，科研单位领题目

“把成果一卖了事肯定不行。但是科研人员跟进项目，一是所在单位的态度不好确定，另一个就是取酬收入怎么

分配很难定夺。”闫大鹏代表说，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在市场检验下不断修改，然而从实验室到流水线，这条路上仍有许多障碍。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难，有代表委员认为，根本问题在于一些科技成果的实用性不强。国家计算流体力学实验室研究员叶友达委员说：“什么样的成果容易被市场接受？当然是被市场认可、用户喜爱的。”

“许多项目在立项时就没有了解市场需求，应用导向不突出。”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飞委员直言，部分研究更重视理论研究和论文，轻视实际成果的转化。

联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月明代表说，建议鼓励企业牵头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成果好不好？价值大不大？企业最清楚。让企业出题目，科研单位领题目，实现‘订单式’成果转化更容易成功。”

原文刊载于《新华网》

2018年3月10日

关注学校发展，了解高校动态，探究办学策略，
更多资讯请浏览发展规划处网站。

编辑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发展规划处

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莲花街

邮编：450001

联系电话：0371-67756273

网址：<http://www3.haut.edu.cn/fzghc>